



市政协委员丁勇：通过技术创新让老人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一碗汤的距离”享受多样化照护

两会手记



我要通过前两年的履职和调研，不断提高议案、建议质量，争取在任职期满时交上一份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上海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指日可待

市人大代表 吕琰

今年“两会”，浦东代表团全团审议现场很热闹，一连3个小时的“抢话筒大战”，很幸运，我抢到了话筒。

去年的浦东代表团审议现场，我也抢到了话筒。当时我向李强书记汇报了关于上海进一步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议，书记鼓励我们进行理论探索。

一年后再度抢到话筒，我向李强书记汇报了最新进展。目前，我们已组建了全市第一律所的银行纠纷调解工作室，将把这方面调解机制运用到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领域，为科创中心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科创中心建设最终要为人民带来实惠。带着这些滚烫的建议，我在会场作了“加强制度供给和民生普惠，助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发言。金融科技企业的创新有没有法律依据和支持？“区块链+”在民生领域怎么运用？这都需要在法律上给出更明确的定义和依据。在我看来法律层面的供给充分了，上海打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生态圈”指日可待。

户外寒风凛冽，会场内气氛热烈。竞相举手、争抢话筒、热烈发言、超时铃响，此起彼伏。大家都希望把握机会，汇报交流履职的感悟、困惑、思考和建议。这次发言也给了我继续努力履职的底气和信心。2020年，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也是我们这届代表5年履职期的中间节点。我要通过前两年的履职和调研，不断提高议案、建议质量，争取在任职期满时交上一份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答卷。

带着滚烫的建议抢话筒

把家变成养老院“单人间”

“现在的养老服务关注老人‘不能’的多，关注他们‘能’的少。”丁勇说，越来越多的理发、超市购物等上门服务，反而变相剥夺了老人们原本不多的社会活动机会。在他看来，只要条件允许，养老服务应该更多地培养老人的自理能力，技术出身的他更希望通过技术和创新的方式让老人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经过多年调查研究，他发现许多老人最需要协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早上起床、晚间就寝、三餐料理以及翻身训练。“对一些康复状况良好的老人来说，一天点对点的服务不超过2小时，剩下的22小时更多是看护。”而这些通过服务上门就能完成，并不需要全天候占用养老机构稀缺床位。

丁勇说，与其他的长者照护之家不同，每位来到“爱照护”的老人，除了在这里有一张床位，在家里也有一张相同的护理床；护理床一样，护理团队也一样。每个离开“爱照护”的老人，在家中可以享受“外卖”服务，执业护士定期上门随访，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就是把家庭变成养老院的‘单人间’”。

设立长护险“人护比”上限

丁勇说，目前，上海面向老年人提供的上门养老服务有两种方式，一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二是从前年起全市试点推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供的上门养老服务。

“上海有30多万老人需要长期护理服务，可是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他指出表现之一就是“人护比”。人护比，是反映服务人员每日人均有效服务时间的指标，人护比越高，人效越高、利润越高。

“长护险服务人员的人护比经常达到1:8，甚至更高，也就是一天平均服务时间达8小时。”他说，在较早推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日本，监管机构对人护比有严格规定，一般不允许超过1:5，“上海很有必要设立人护比上限。”他认为，如果为了追求利润，服务供应商想办法提高人护比，会以牺牲服务质量为代价。

在一线护理中，丁勇还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套证”现象，无证人员通过“套证”，2人或多人共享养老服务员（医疗照护）证，提升“人护比”。再就是服务“套现”，在不提供满时服务、达标服务的情况下，仍然说老人在服务确认单上签字。“这些细节看似是服务人员个人行为，背后却反映了长护险监管体系的漏洞。”

丁勇建议上海设立一个“长期照护管理中心”，统筹长护险监管职能，提升服务质量，确保几大基本功能，比如匹配符合资质的服务供应商，实现对护理服务的高效监督和有效管理等。

对老人进行身体防护培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大城市的空巢老人，他们很容易遭遇‘社会孤立’危机。”丁勇综合多年实践经验，为那些容易陷入社会孤立的高龄老人画了一幅肖像：患认知症，有囤积垃圾旧物等习性；单身老人；少言寡语；遇到困难没有能够依靠的人；与邻居等几乎没有交往；健康状态不佳；生活贫困。

“我们应该帮助和支持空巢老人获

得基于自立的多样化社区居家服务。”他说，其实在空巢老人熟悉的社区，就可以探索预防社会孤立的体系和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因为只有提高自理能力，实现有尊严、有乐趣的生活目标，才能满足空巢老人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有效预防社会孤立。”丁勇说，上海街镇在组织辖区内为老服务工作人员等服务力量对社区内空巢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方面，一直做得不错。他建议，在此基础上，还可由街镇引导，在社区层面建立照护顾问小组，为空巢老人提供“360度”社区服务资源对接服务。“小组可以由‘志愿者+专业人员’组成，成员包括社工、康复护理专业人员、楼组长或社区热心志愿者，也可发挥周边企业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为照护顾问小组掌握更多服务资源和渠道。”他说。

“就像老人们热衷在老年大学学书法、舞蹈等，我们也应该给老人开一些身体防护‘培训课’。”丁勇说，提高老人的自理能力，也要从早期干预几件事，比如衰弱、疼痛、摔倒等。“很多老人身体机能下降都是从卧床开始。”他说，卧床久了，身体开始衰弱，肌力慢慢下降，更容易摔跤。技术出身的他曾经对护理过的老人调查过，衰弱、疼痛、摔倒这三件事只有一项在老人身上发生，之后要接受长期护理照顾的比例增加2.7倍以上；如果三项都有，增加比例上升到8倍以上。

“我还能动，我还有力量，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对康复期的老人尤为重要。”丁勇说，他接触过的老人，无论是84岁的父亲还是“爱照护”的其他长者，其实都不太喜欢被人服务。“让老人活得更像正常人，这是养老服务的另一种方式。”

养老服务要通过资源、空间、时间和人的有效配置，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让社区老人在“一碗汤的距离”享受多样化的照护服务

本报记者 彭薇

“养老服务要通过资源、空间、时间和人的有效配置，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会场，市政协委员、上海万里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理事长丁勇谈到了社区和居家养老话题。

今年也是丁勇委员投身养老服务行业的第13个年头。作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的探索者，他在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创新实践了多年，打造了一种既可“堂吃”，也能“外卖”的居家养老模式，让社区老人在“一碗汤的距离”享受多样化的照护服务。

市人大代表顾立军：市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已突破90%，但仍需“更上层楼”

有害垃圾量虽最小危害却最大

本报记者 杜晨薇

2019年1月31日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通过，上海垃圾分类从此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这让海派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也是连续两届的市人大代表顾立军满怀欣慰，因为这部法规的诞生，离不开他和一届又一届代表们持之以恒的呼吁……而今，法规仅仅面世一年，实施半年，却促使上海垃圾分类的全民参与度较过去提升了70个百分点。

这是与垃圾处置打了18年交道的顾立军最深切的体会。早在2000年，包含上海在内的全国8座城市已经开始试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起初，呼声仅在业内高涨，上海许多从事和参与垃圾末端处置的企业、机构开始通过二次分拣实现垃圾分类处理。而广大老百姓，尽管对于垃圾分类理念的知晓率和

认可度在逐年增长，但参与率却徘徊在20%上下，长期难以突破。

几年前，顾立军所在的宝山代表团在两会期间递交了一份有关上海垃圾分类全民参与的调研报告，并呼吁立法。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代表联系社区，调研垃圾分类情况，并用建议的形式，为立法工作做准备。

垃圾分类真正形成热潮，是从去年上海率先立法开始的。《条例》在人大通过后，上海市随即召开全市范围内的垃圾分类工作动员大会。很快，各个乡镇、街道、园区都行动起来。到了4月，一批率先试点的小区已见到明显成效，甚至探索出一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顾立军说，就拿他任职的海派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来说，公司主要负责宝山区吴淞街道和友谊路街道部分10平方公里、12万人口的生活垃圾收运工作。在立法以前，辖区的垃圾必须依靠环卫工人再分拣，才能呈现干、湿、有害、可回收四

分类的区别。

立法后，垃圾分类的达标率很快升至70%左右。特别是《条例》正式实施后，在“不分类不清运”的规则下，许多小区、企事业单位的分类率再一次显著提升，而今，辖区内垃圾分类达标率已经稳定在90%以上。“这达到了许多发达城市的垃圾分类参与水平，甚至已经超越他们。”顾立军说。

更令人欣喜的是，如今上海市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已经突破90%，相当于一年内跃升了70个百分点。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顾立军提交了一份与有害垃圾处置相关的建议。“我们在垃圾清运过程中发现，有害垃圾的量虽然是最小的，但危害性最大。”他建议由有害垃圾处置能力更专业的市生态环境局作为主管单位，在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配合下，对不同类型有害垃圾的分类、运输、处置方式进行细化，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保护环境、造福万民的事。



由有害物处置能力更专业的市生态环境局作为主管单位，在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配合下，对不同类型有害垃圾的分类、运输、处置方式进行细化，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保护环境、造福万民的事

本报记者 茅冠隽

“感到很有成就感！我们提出的这份议案最终能通过《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得到落实，相信今后家政行业的各种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市人大代表王芳告诉记者。

去年上海两会上，包括她在内的14位代表提出了《关于提请市人大制定本市家政服务行业管理条例的议案》，呼吁对家政服务行业管理进行立法。去年12月，《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获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将于今年5月1日颁布实施。

身为上海海阔东岸文化创意产业园执行董事，王芳长期从事文创产业，为何会关注家政行业乱象问题？“其实和自己、身边人的切身经历有关。我自己从生孩子到现在，家里一直都是请家政服务人员，但一方面服务质量很难保证，另一方面有些服务人员还有偷窃衣

物等情况。”

王芳告诉记者，碰到这种情况，雇主往往只能小心翼翼地给足工钱，然后找个理由把家政服务人员辞退。“可辞退后，这些人依然活跃在家政服务市场上，进入其他家庭服务……”上海目前的820多万户家庭中，正在使用或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超过三分之一。随着“用工荒”的到来，家政服务人员的缺口越来越大，肆意抬高价格、行业恶性竞争等问题日益凸显，通过立法规范势在必行。

为了提交议案，王芳去年做了充分准备。和朋友聊天时，她会主动提起家政服务市场的话题，搜集更多的“吐槽声”；闲暇时间，她会主动走进街边的家政服务公司，看看机构的运营情况。去年夏天，上海市人大将《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列为正式立法项目。之后，她跟随人大调研组去位于闵行区莘松路的提供各类生活服务的“悦管家”平台，了解“家政服务可追溯管理

体系”的运作情况，也曾在市人大常委会家政服务立法实地调研座谈会上“抢话筒”：“请保姆、请阿姨，并不只是请钟点工，还有住家阿姨，这关系到照顾老人、照顾婴幼儿，所以保姆的素养和技能培训很重要。另外，由于市场供不应求，家政服务人员很容易出现频繁跳槽、随意涨工资的情况，但实际服务水平并不尽如人意。”她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得知《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通过市人大常委会表决的那一刻，王芳是兴奋愉悦的：“这意味着上海家政服务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改善有法可依。”但王芳坦言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立法是解决家政行业乱象的关键一步，但不会是最后一步。想依靠这部条例让家政市场一下子大变样并不现实，我会继续关注家政服务方面的问题，多上门调研，为市民能享受到更安全便捷的家政服务贡献力量。”

市人大代表王芳：家政服务立法是关键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

为市民提供更规范家政服务市场



政协委员，抑或人大代表，不能仅仅是一名思索者，还必须成为一名行动者

我们需要广泛调查搜集信息，深入研究，提出应对措施以及实施办法，然后落实、跟踪、监督

市政协委员 薛舒

一年一度的“两会”，似乎总是在最冷的那几天召开。上海的冬季，阴雨天特别多，清晨，天色还未完全透亮，接驳车已停在站点，接车员早已认识车上的每一位委员抑或代表，她会告诉你：眯一会儿吧，到了叫你。

8年前，第一次担任政协委员的我说的是城市生活与文学的关系，洋洋洒洒的抒情，充满激情的叙述。会议期间的界别讨论会，作为一个新人，我迫不及待地举手发言，说我的担忧，说我的意见，说在日趋娱乐化的市场大环境中，文学要如何树立城市文化的品牌……当我打算把我写下的散文标题“提案”的名头时，我被告知需要提出更具体的方案和办法。于是，我开始学习，读很多优秀提案，向资深政协委员讨教学习，学着如何把我激情澎湃的散文变成提案。

抒情、批评，甚至发牢骚，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需要广泛调查搜集信息，深入研究，提出应对措施以及实施办法，然后落实、跟踪、监督……不再是只做一名“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今年，是我拥有政协委员身份的第八年，文学创作依然是我的热爱和梦想，偶尔，我会问自己：倘若说，文学的任务是发现困境，那么解决困境的任务又由谁来完成？政协委员，抑或人大代表，不能仅仅是一名思索者，还必须成为一名行动者，因为，让一切变得更好，是我们的责任所在、意义所在。

把「散文」变成提案

上海家政服务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改善有法可依

我会继续关注家政服务方面的问题，多上门调研，为市民能享受到更安全便捷的家政服务贡献力量